

论文化建设的快与慢、动与静

田川流

(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迅捷的态势,适度融入慢和静的因素,有利于文化建设的科学运行。在文化建设领域,更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部规律,改变盲目追求文化建设的速度与宏大模式的现象,把握快与慢、动与静的协调一致。

[关键词]快与慢;动与静;社会与经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14)01-0076-06

在当代文化建设领域,快与慢、动与静的课题已进入人们的视界。面对迅捷发展的文化产业,人们需要理性地加以思索,应当以怎样的速度和运行模式推进文化建设。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在伴随社会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之后,适度注入慢文化和静文化的因素,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策略。在文化建设领域,更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部规律,改变盲目追求文化建设的速度与宏大模式的现象,科学把握建设与发展中快与慢、动与静的有机统一。

文化是人类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文化发展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从来都是快与慢、动与静的对立统一。世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实体和历史进程,既存在一定时期的快速发展,也有演进较为缓慢的时期,呈现出不同时空中快与慢的交替,以及动与静的相错。正是这种快与慢、动与静的有机构成和运动,成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历史,世界也在这种快与慢、动与静的矛盾和交替中发展至今。

作为规律呈现的快与慢的有机运动,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律动和节奏使然。快与慢、动与静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快与慢体现为运动的速度,动与静则显示为运动的模式。在社会快捷发展的时期,由于其快的速度和节奏,较多出现动的结构和形态,呈现出剧烈运动的态势;而在较为平和的社会发展期,则呈现出较为缓慢的速度与节奏,以及偏于静的态势。在哲学意义上,快与慢不仅是时间或进程的概念,有时更体现为人的一种意识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表现为人们对世界的感受与理解,以及对自然与社会运行方式驾驭所达到的自由与自觉的程度。因此,它既是客体自然与社会运动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是人对世界的精神认知和实践掌握的体现。

快与慢、动与静既相互对立,又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快就没有慢,没有动就没有静,反之亦然。历史的进程表明,当社会长期处于进程缓慢、迟滞不前时,人们就要促使其加快运行节奏和速度,制造宏大的气势,甚至采取革命的手段,不惜付出重大牺牲,打碎业已形成的沉重的社会结构,扶持和催生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推动社会快速发展。而当社会处于相对稳定与平和的时期,则会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慢与静,它是对于快的发展节奏和动荡的运行模式的适度调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客观和必然的,但其速度是可调整的,其模式也是会出现变化的,世界始终在快与慢、动与静的变奏中前行。当西方处在中世纪时,其发展速度明显慢于东方中国。而当欧洲进入文艺复兴以后,其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超越了中国。此时的中国虽然也在发展,但其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西方,因而造成几百年后的巨大差距。快速或缓慢的发展速度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时看来好像是快,但是由于付出各种代价和生成的负面效应,其实是慢;而有时看似慢,但由于整体机制获得有机运行,做到整体的协调一致,反倒是在实质上做到了快。慢与静不是容忍人的惰性,而是通过张弛有度的把握,做到对于客体世界、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科学把握。

快与慢、动与静既是社会自身内部各种因素聚集、凝结和碰撞的结果,同时也与人的推动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掌握世界的能力与自觉意识的增强,人的力量对于世界发展的进程显现出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从本

[收稿日期] 2013-09-03

[作者简介] 田川流,男,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人类文化学。

质来看,世界的发展一般会遵循其内在规律不断前行,而当人的能动作用开始施于其进程并不断增强时,世界的发展也会随着人类作用的大小以及方向的导引而获得改变。人有能力顺势推进社会发展,但不可能超越历史的规范,更不可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速度的快与慢、运行模式的动与静不仅是人驾驭世界发展的主观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人们遵循与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意识的表征。一般来说,加快社会发展是人们的普遍愿望,特别是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落后于其他民族时,急速的变革、甚至宏大的革命都是必需的和合理的,不如此就不能改变落后面貌。而在社会处在动荡与革命的态势下一般难以获得科学与理想的文化变革,只有在相对平和与稳定的状态才能实现社会文化的全面与协调发展。

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节奏及运行模式,是人的智慧与能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以及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渴望,激励人们总是希望社会出现快速的发展,但如果缺乏科学与理性,则往往适得其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表现出人们对于快与慢、动与静的辩证思考;“欲速则不达”则告诉人们,未必有着良好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既定的目标。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轨迹警示人们,应当审时度势,科学观照社会的衍变,而不应一成不变地追求发展的高速度和宏大气势。

中华民族正是在20世纪以来进入一个历史的较快发展期,这是一个动荡多于平和、斗争多于平静的时代。在人们看来,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是危险的,正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激发出改革社会、促进社会迅速改变的愿景,激励人们在动荡和斗争中前行,以求在不长的时间里获得较大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几代人逐渐习惯了快优于慢,动优于静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宇宙运行中,快与慢、动与静都是相对的,从来也没有绝对的快,也没有绝对的动,历史正是在快与慢和动与静的交替进程中一步步衍变至今的。

确立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是当代人们对革命之后的社会发展予以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社会革命,对古老的国度予以巨大推进,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未能取得的成就。而当革命的急风暴雨掠过之后,如若社会发展长期处在一种加速的状态,就会使人们缺乏必要的思想沉淀与反思,难以顾及精神层面的深度审视,使社会易于出现浮躁与失衡,失衡必然导致偏颇。对于社会运行机制的选择,以及各项政策的制定,均应依据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历史基础来决定,坚持走符合自己特点的道路,而不是机械地模仿他国范式或追求某种既定的模式。历史表明,激烈的斗争与动荡性革命,可以带来社会的巨变,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当社会进入全面和深入发展的时期,则应尽力避免过分的斗争、冲突和运动式剧变,以免人民付出过多的代价。坚定社会改革的目标不可动摇,只有清醒地辨析来自“右”和“左”的不同风潮的影响,排除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才能有效推进改革进程。倡导融入慢与静的因素,正是基于我国现实对科学发展的深度理解,是对社会与文化建设实现科学推进的重要策略。

二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结构中,文化始终居于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文化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是宏观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一翼;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又与狭义的社会建设相并列,与政治、经济等建设同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面对社会建设还是经济建设,均应具有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掌控,既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和总原则,又要以科学与理性为主导,以求获得更加和谐的发展。适度融入慢与静的理念,正是对各领域协调发展的宏观审视和科学驾驭。

当代社会建设既是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又是基本动力。当社会建设进入更深的层次,尤其需要把握快与慢、动与静的协调统一。

社会建设致力于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对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进行处理和调节,公共性和公益性是其突出特色。社会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例如,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伦理,建立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当代,应当倡导在法制的基础上,以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以及和而不同的理念作为社会的道德基准;应正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全球性价值理念趋于相容的客观性,强调社会公共权力的有序化及其有效的控制,致力于建立和谐的民主社会,健全公正的分配制度,呼唤得到社会共识的公民道德,承认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促使人人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由于革命时代产生的剧变,可能会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产生抵牾,出现某些失衡与失谐。社会的伦理关系及其观念的健全与成熟,也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调整方能奏效。而在社会伦理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与恪守的过程中,需要人们从事细致的工作和具有足够的耐心。即使一些当下境况与人们的期待不一致,也须假以时日逐步调整,而不是一味加快其变革

进程。

社会建设又充满了丰富和细腻的人际关系因素,采取动荡的和运动式方式也未必合适。其间,人际关系的优化与人性的倡导已成为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由于我国积存着大量历史遗留的问题,加之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人的地位与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人际关系的调节面临巨大的挑战。社会分配不公、差距加大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等,极大地侵蚀着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当代社会建设中,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的,同时也是敏感的。如果继续采取革命时代统一思想的做法或者群众运动的形式,均难以代替艰苦细致的工作,以及个性化因素的调整。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考,应当改变那种以斗争解决人与人关系的传统理念,尽力消除和避免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正视和努力克服那些可能产生剧烈冲突的因素,坚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以求人际关系的逐步好转。

历史的发展与一切事物一样,都是具有节奏的,即不可能一直处于过快或过慢的状态,总要在不断的变奏中走向未来。人的作用从来都是重要的,也是相对的,应注重对这种变奏的适应和因势利导,而不是对于客观规律的强行扭曲与改变。快与慢和动与静的辩证统一表明,有时可能退一步才能进两步。退一步,在中国人看来是“蓄势”,即对于事态的全面观照和准备,应对各种可能产生的问题和隐患。而只有完成蓄势,才能有把握地打出取胜的一拳。因而,有时看来是慢,其实并非慢,而是对于事态的宏观审视和把握。

当代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石,经济建设的推进同样需要注入慢与静的理念。

在历史上,人们曾经无数次宣示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确实也曾创造出大量人间奇迹。但是,一味强调人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超越而不是顺应,将会给人类巨大的灾难。当破坏大于建设,社会就将走向衰败;当建设要以自然或伦理的损害为代价,就会打破自然与社会的平衡;当生存的奢侈超越人的生理或精神机制的需求,人们就将沉溺于物质的泥沼;当经济发展的冲动跨越人的理性意识与自然世界的容受度,世界也将变得畸形。

资源的开发与使用需要适当放缓速度。人类对于资源的开发已经显得过分和无度,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得人们早已感受到资源枯竭对人类的威胁,面对资源的竞争甚至出现人类之间的角斗和血腥的战争。对于有限资源的合理与科学的使用,已经严峻地摆在当代人面前。我们应当更多地顾及后人,而不应无度地消耗资源,不能再搞那种杀鸡取卵殃及后代的事情。

基于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一些建设项目应从长计议。人类的快速发展,往往要以环境的污染与损害为代价。如果在一定时期可以将此视作不得已的话,而在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之后,就应将环境保护问题放在超过某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良好的环境保护,不仅为当代人的生存造就适宜的条件,更是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可以说,良好的环境保护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基础建设的速度也需要因地制宜。不少官员出于自身任职期间政绩建设的需要,大力从事基础建设,而一些基础建设的科学性与必要性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许多地区和城市还在许多方面缺乏必要的设施,特别是公共设施更显得匮乏,需要继续建设。然而,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对于基础建设的规模也需科学规划。在当下,不排除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过多或密集建设的迹象,以及与他国、他城盲目攀比,创立“新高度”的畸形心态。特别对于住宅而言,一方面是人们的住房缺乏,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人住房的富余,甚至囤积住房,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严重危害着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

城市化发展也需要快慢有致,动静相宜。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地位、功能与资源的集中,造成了一些大城市的巨大优势,同时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但是,少数大城市的无度扩充,也是造成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人们对少数大城市的过分向往和踊跃进入,导致社会问题的频出以及生态质量的下降。适度控制其发展速度,注重城市的特色化建设,是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政府倡导的城镇化进程中,也应尽力防止运动式、大呼隆、订指标等做法。

过高的经济指标的增长,过量的基础建设,单纯追求GDP的提升,未必能增进人民的生活的幸福感。人民生活的幸福度是由物质丰裕的程度、安全感、价值的实现、人际关系、生存的舒适度等方面因素构成的,并非单一地由物质的丰裕度来决定。过度的改造,过度的开发,过度的耗费,是人类对自身的损毁。经济上的快速挺进似乎显得十分富有激情与进取精神,但是如果失去科学的理念,造成发展格局的失衡,就会对当代以及未来人们的生存造成极大的损害。

三

文化建设是人类智慧、能力的表现,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论述未

来的理想社会时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 文化建设正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人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重于物的发展，而在文化建设中，更须时时考量人的发展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既有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也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人的基本需求，应与人的欲求相一致，同时文化建设又需要以人为主体，通过人的能动作用的实现，推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当代社会文化基本状况充分表明，当快节奏与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生活机制的变化时，也迫使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活的污染使人们小心翼翼地过活，钢筋水泥的建筑使人们失去了田园之美与人际间的其乐融融，城市的拥堵给人们带来生活的无奈与烦躁。而在精神追求方面的过分单一，又使得人们机械地追崇某种理念而失却独立思考。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进入深度研讨，怎样才能科学调节人与客体世界关系的同时，实现人对自身的科学掌控。

人的内在肌体和运行机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表现形态也体现为快与慢、动与静的有机统一。

人的生物性表明，人的肌体是在有限的条件下予以调节和运行的。与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一样，人的肌体运行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人类既不可以扭曲宇宙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不可能扭曲人的自身规律。人对于自然世界和人自身，只能充分地适应和顺应其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积极的作用，促进其向着有利于人的生存的方向发展，而不能不顾其客观规律，强行扭转其运行方向，或者长期处于超越人的机能的快节奏运行之中。人的自我世界，既包括人的肌体与各种器官，同时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无论哪个方面，均难以超越人所能够达到的能力和高度，不具备任意夸大自我而随心所欲的能力，不可能做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违背客观规律和自身规律的奇迹。

生命在于运动，同样也在于静养。其实，运动本身就意味着动和静的有机融合，并非始终处于激烈动荡的状态。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中的关于颐养的理论，实际就是对于动和静这一现象的辩证考察和把握。正是关于“颐”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科学认知。“颐”一方面体现为动中有静、动静结合的辩证关系，同时又在另一维度表达出中国哲学对于事物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认识，那就是应当注重有机推进、滋养、涵育等内涵，反对激烈动荡，反对那些违背人的内在规律的现象和行为。

慢与静的融入，既适应人的生物性特征和人的心理机制，又有助于制约浮躁与喧嚣，调适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节奏。人对自然的把握，同时包括对人自身的认知与把握，人们只有洞悉人的自我特性，才能科学地掌控人的内在机制的基本特性、运行方式及其节奏，在偏于快速的运行中适度融入慢的节奏，在一些动的形态中适度添加静的因素，使人们真正获得精神与肌体运行的协调、主体与客体世界的一致。在当下，一些人倡导的所谓“慢城”，正是与此相吻合的理念。

人只有在自由发展中才能够完善自身，所谓“诗意的栖居”或审美化生活，正是对人的自由生活方式和理想境界的追求。

在当代，审美化生活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人们有选择自身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可以充分显现审美化情趣、艺术精神与娱乐精神的意愿。这些均具有人的向往自由的本原意义，更易于彰显当代人文化精神的价值。人们既可以参与审美或娱乐活动，追求生理与心理快感的满足，更可以进行对审美化生活目标及其精神的追求，正是藉此，契合了人的本我和本真的意识显现。

审美化生活，主要在于对自身精神和生活秩序的掌控，以及对生活质量的有机把握，其重心在于对审美情趣的创造。生活的幸福感不完全在于物质生活的丰厚，但又必须以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和满足为基础。人们幸福感的获得，更多地是生活秩序的稳定，生活情趣的创新，其中较多表现在衣食起居的适意、人际相处的和谐、精神追求的丰富等方面。在此意义上，适度的慢与静，要比一直处于快捷和动态的境况中更适合人的本质需要。

审美化生活，还在于对自身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合理安排。人类过快地使用自然资源，势必带来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而人们过快地透支自身的能量，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包括肌体的损伤和能量的耗费，乃至精神的扭曲和畸变。人们时常陷于无休止的竞争与拼搏之中，没有忙碌间隙的闲适，没有拼争中的喘息，更遑论精神休憩的优雅，因此也就失去了变奏与节制，难以在一张一弛的动态运行中调适自身。

审美化生活，还在于生活格调的提升，注重对较高文化意蕴与审美品位的追求。人的审美精神的成熟，意味着人不仅能够做到对客体世界的科学掌控，还在于对自身的有机把握，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正是对人的自由翱翔的畅想。人的审美意识与精神的提升也需要在相对平缓与静态中方能实现，需要营造更多适宜

于人的精神畅想与情感交流的空间。审美化生活及其对艺术精神的追求,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应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生活方式。

人们的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出现,更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沉思与探索的过程。每当历史处于变革时期,特别是动荡的岁月,正是易于产生思想的年代。但人们在探索中获得的思想成果需要沉淀。只有经过沉淀,方能使民族的思想精华得以凝结和聚汇,进而逐步实现体系化、精致化、经典化,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中国曾经沉寂太久,节奏过缓,世态过分沉寂,需要变革,需要激荡,需要加速。一个世纪过去,中国人经历了较多的疾风暴雨和霹雳闪电,大量闪烁着人类思想光辉的精神成果已经出现,但至今仍缺乏梳理和辨析。当革命风暴业已消退,人们理应沉静下来,对每个时代的精神建树和思想成果予以整理、反思和总结,经过披沙拣金,提炼精华,使之成为民族的思想瑰宝和世界的精神财富。

作为个体的人,在动态和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同样难以获得静思与涵养的机会。真正的思想成果往往形成于急剧变化的年代,又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反复检验和实践,难以在一个动荡和瞬息变化的年代得到成熟。真正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既需要时间加以梳理与提炼,也需要时间的检验;既需要避开各种纷扰而加以观照,又需要在各种环境中得到验证。笃静,而后进入沉思,方可澄怀味象。只有在相对静态的氛围中,人们才能摒除干扰,对客观事物予以科学审视,获得思想的成熟与精神的提升。

四

在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科学发展应成为基本宗旨。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历史上形成的快比慢好的思维模式,通常将加快发展视为进取和革命,而将适度提倡慢的主张视为保守和消极。事实上,科学发展从来都是快和慢、动和静的协调一致。当文化建设进入稳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时,更应适度注入慢的和静的理念。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应成为人们的高度自觉。

尊重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文化建设的首要原则。关于文化的发展,在其大部分时期应当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但也常常会出现不相适应。马克思曾经深刻阐述过艺术发展与社会及其物质基础发展的不平衡原理。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48}文化的发展除了受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是其内在规律使然,其内在规律以及各种因素的聚集和多重作用,使得文化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科学洞察和尊重文化的内在规律,是文化建设的第一要素。政治或经济发展的需求当会对文化发展提出要求,并促使其发展,人的作用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些均不应成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唯一动力。文化建设速度的快与慢,其运行模式的动与静,均应在遵循文化艺术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加以调节,并在充分依据其基本特点的前提下实施对文化的推进。

文化发展的快与慢,不应以文化设施的多少和技术的先进与否为主要判定标准。在文化建设中,那些赖以承载文化内容的设施、场所及技术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增长和提高,但是作为文化的精神、思想与意蕴的含量,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较大提升。由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殊规律,例如其自律性、自调节性等,使得文化可以在没有人为施加过多影响的条件下,也会获得一定发展。而在人的作用下,首先可以在其设施、技术等方面实现较快增长和改进,为文化水准的提升创造积极的条件和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准和质量的提升,更不是文化软实力的主要体现。只有加大文化内容创新的力度,不断增进文化产品的精神意蕴与审美含量,才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真正体现。而在这一方面,往往不是以完成时间的快慢来作为评价尺度的。

文化建设的进程不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在文化建设中追求轰轰烈烈和宏大模式,这种做法确实具有发动群众和凝聚精神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历史转折与演变的时刻,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常常能够营造宏大的气势。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来讲,世界始终是在动态中演进的,静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但是,文化的深度与全面发展又常常出现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文化提升主要体现于人的精神层面,这就需要营造相对稳定的状态,让人们通过充分的思考和探索,经过积极的思想碰撞和理念对接,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凝聚成文化的结晶。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动态演进,只能说是在外部环境相对静态的机制下,对人的思想的触动和想象力的激活。它更多属于精神与思想层面,而非外部环境层面。“大跃进民歌”的失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都充分昭示,文化建设尤其不应以运动的方式来推进。

其结果不仅不会有益于文化建设,而且常常适得其反,生成对文化的破坏。

优质文化产品的涌现,不是单一以数量的多少来确认的。经过人的一定努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数量可观的文化产品,但是,真正的文化经典只有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比较才能凸显出来。文化产品的数量众多可以满足大众当下的需求,同时也为文化经典的出现奠定基础。然而,大量优质文化艺术产品的涌现,还有待于多种举措的全面实施,比如赋予文化生产者更大的创造自由,推进文化创新环境的全面改善,实现全民文化接受状况的较大改观等等。如果只注意文化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的提高,即使生产出数量可观的产品,也未必能够促进文化水准的提升。看上去属于同类的文化产品在质量上可能大相径庭,有时成百上千部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也未必抵得过一部优秀作品。事倍而功半,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形。

文化建设的快与慢,同样不能单纯以其实现经济效益的高下来判定。文化产品效益的实现,是由审美价值、认知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等多种效应综合而成的,经济价值仅是一个方面。只有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融合的坐标上,才能正确判定其价值高低。而文化产品的精神价值,又常常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彰显的,有时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才能真正辨析其高下。经过验证,一些曾被人们视为文化建设重要成果的作品或样式,或者能够继续显现其积极价值,或者经不起时间和社会实践的检验,逐渐失去其光彩,甚至有的会出现负效应。“十七年”间众多曾经十分耀眼的作品,由于极左思想理论的浸染,未能经得起时间检验,逐渐失去其历史价值,以致使得“十七年”整体文化成就也大打折扣。对文化建设的审视,有时表面看去的快,实则属于真正的慢。而一些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可能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才会逐渐放射出光彩,呈现其不朽的意义。

文化是多元的,其建设与发展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标准或尺度来把握。无论任何文化产品的生产,均应在鼓励人们积极创作的基础上,强调克服粗制滥造,力求呈现较高的文化水准。对于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建设,也应采取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要求。对高雅文化创作,应当要求艺术家潜心创作,而不是心情浮躁、抢时间、造声势,以速度取胜。对那些具有较大精神张力和思想容量的艺术创作,更不要以时间来作为基本要求,而应鼓励艺术家精雕细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传世之作。为了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适度加快文化产品生产的速度是必要的,但是,即使作为当下大众文化中十分兴盛的通俗文化的生产,也应以具有积极健康的格调和一定的思想容量为前提。哪怕是快餐文化,也须保证其基本的文化质量。精品文化与快餐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真正充满了文化内涵与精神含量的产品不在于满足人们当下娱乐的需求,而是为了有助于实现全民族所有成员审美与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这样的产品,是注定不可能在快餐中得到的。急功近利,追求浮华,浅尝辄止,势必会制造大量文化垃圾。

人民大众文化素质与审美能力的提升,更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在于全面实现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精神的解放。在当代,人们渴望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与大众文化素质的显著提高,但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当人们时常为大众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的问题感到焦虑时,往往忽略一个严峻的事实,比起经济建设甚至文化设施与文化成果建设来讲,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进程,难以与经济发展成正比,需要付出长期大量与艰苦的努力。其间,应当警惕漠视大众文化权利的现象的恣行。那些试图以运动的形式,或者灌输的方式,希望在一个早晨就改变大众的文化素质与思想水准的做法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带来对大众文化素质的扭曲。

科学地驾驭文化发展,既表现为人对客体世界超越的自由,也表现为人的意识的高度自觉。二者的统一,即做到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适应与实施进程中的游刃有余。在文化建设中,只有凝神静气,千锤百炼,才能创造大量高层次的文化成果,真正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当代,社会发展仍是人们关注的核心,人的发展也已提到重要议程。在加快发展的主旋律中,适度融入慢和静的因素,做到快慢适宜、动静结合,即可演奏出更加浑厚、震撼的交响,登临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当代人们在掌握世界的进程中进一步接近了自由和自觉。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Sovereign debt management: mode selection, macroeconomic coordin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LIU Xiao-xing, LÜ Xing-jia, ZHANG Ying • 44 •

Sovereign debt crises in Europe and the US in recent years have showed that effective sovereign debt management (SDM) can help governments mak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achieve the stability of financial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SD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e of the three typical modes of SDM, explores how to separate SDM from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m since SDM is an important point connecting fiscal policy with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DM on financial stability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debt stock, debt structure, investor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of debt capital market.

(8) Transmission effect of the US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MA Ye-qing, YIN Yi-ling, ZHANG Yu • 51 •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C) carried out a repurchase operation in the open market in the latter half of 2012, which set a record in the hours of operation record and the day volume of transactions in ten years. Because both the reverse repurchase of PBC and the US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are essentially the release of liquidity in the market, the research in US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China. B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monthly data of the US QE1,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US dollar and anticip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domestic price. Our findings show that domestic price is slightly influenced b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US dollar weakens sharply under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For this reason it is concluded that monetary policy aimed to stabilize domestic price can minimize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9) A study of economic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its database in commercial banks

ZHOU Kai • 57 •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capital must be based on data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data accumulation on the efficient measurement of the three risks of economic capital, i. e., credit risk, market risk and operational risk. Economic capital measurement is a choice that China's large banks have to make again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Basel III*. As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it is a prerequisite and strategy they should take in order to achiev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a balance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and an increase of the overall profit-making capacity.

(10) Factors analysis of the availability of loans to farmers in Jiangsu provi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mal and non-formal financial sectors

LIU Rong-mao, CHEN Dan-lin • 61 •

Farmer's borrowing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for the rural finance research.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rmal finance and non-formal finance sectors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farmers' access to formal financial and non-formal financial loans on the basis of the sample data in Jiangsu province. Due to its limitation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formal financial sector stresses family income, value of collateral, guarantees and other factors. By contrast, non-formal financial sector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farmer's social capital, personal skills and other factors since it has more advantages in obtaining information on farmers. Our conclusion is that influential factors of farmers' access to loans through formal financial sector in Jiangsu include age, number of laborers, income, mortgage and guarantee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through non-formal financial sector are income, skills, personal reputation and guarantees.

(11)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budget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QIAO Chun-Hua • 68 •

Budgeting is essentially political, but all literature about budget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based o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budget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power struggle,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trickery is not to deny its political nature, but to call for the moral rule, rule by law, and democracy.

(12) An art order of change and immobility

LIANG Jiu • 73 •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 studie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China entails an order of art. Defined as a discipline, the word "arts" rather than "art" is more accurate;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conceive a concept of change and immobility: what changes embodies the four essential factors: emotions, concepts, values and means while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the artistic taste. We hope to establish an order of the Chinese art stud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principles, carry forward the research in national art studies, and ultimately found the academic schools of our own.

(13) Tempo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IAN Chuan-liu • 76 •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swift in China. Howev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slowing it down in order to achieve a healthier development. In this sense, we need to follow the law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void the single-minded pursuit of faster speed and larger scale.

(14) Futurism without a fu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Boccioni and Joyce

HE Yun • 82 •

The prevalence of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gave an impetus to European artists. They tried to conceive a brand-new artistic concept by break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or sight and hearing. Futurism was considered a pioneer and